

十九大以来国内对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研究进展

沈可龙¹, 何娟²

(1.湖南工商大学 国际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自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之后,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可归之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逻辑依据、时代意义、科学内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举措、辩证认识和处理与社会主要矛盾相联系等方面。已有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拓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科学内涵、西方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 and 实践以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对策和路径等。

关键词: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1)06-0077-11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1.06.011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HEN Ke-long¹, HE Juan²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Hunan 417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assertion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was clearly put forward i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academia has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logic ba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initiatives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and handling of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existing research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expand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wester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methods, countermeasures and paths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new era; transformation of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research progress

收稿日期:2021-09-16

基金项目: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委托项目(19WTC08);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9B300);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教师建设“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20GG049)

作者简介:沈可龙(2000—),男,湖南长沙人,研究方向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研究; <http://www.cnki.net>

何娟(1984—),女,湖南华容人,讲师,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科学论断之后,我国学界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回顾和反思十九大以来学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文献,剖析其中存在的不足,明确今后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对于进一步推进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深化人们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提高人们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逻辑依据

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首先要弄清矛盾转化的逻辑依据,国内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行了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三个维度的考察。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逻辑

一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理论角度进行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为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参照。有学者指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基本内涵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由此,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始终把社会生产和发展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社会主要矛盾不仅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而且矛盾的特殊性还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阶段性和发展性的特征,因此我们要根据发展形势的需要,及时调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2]。还有学者指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要矛盾”的术语,但在他们一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始

终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及其作用的分析作为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切入点。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论断,正是对这一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3]。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本学特征的角度进行阐述。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标,把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取向作为社会历史研究的逻辑终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党不懈的追求和崇高的使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理论的自觉运用^[4]。

三是从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观的角度分析。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以人民解放和发展为目的的,因此,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的把握与判断要从从事具体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而需要作为人的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它是人进行社会活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因此,我们对主要矛盾的判断要从广大人民的需要及其需要的满足程度出发,即本质上要围绕广大人民的需要和社会生产发展之间关系这一轴心展开^[5]。

四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发展的角度来阐释。有学者提出,习近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而且在主要矛盾的阶段化和具体化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我国基本国情不变的前提下,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这赋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阶段化、时代化的特征。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将社会主要矛盾具体化和人性化,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6]。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逻辑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准确判断,高度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成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分析,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迅猛发展,201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为19.8%,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一批如天眼、蛟龙、天宫、大飞机等高精尖科技创新成果相继问世^[7]。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综合国力已跻身世界前列,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在工业生产、货物贸易和服务业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的经济体量全球第二,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超过30%^[8]。总体来说,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已转向经济剩余,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国际地位极大提升^[9],这些都说明“落后的社会生产”已不符合当今的社会实际。在充分肯定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基础上,也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状态得以化解,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尚未得到解决。例如:城乡、地区、领域和群体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社会贫富差距突出,经济发展方式相对滞后,发展的质量不高,效益不好、创新能力不强,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保障缺失,民生问题欠账较多,高品质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上升为制约社会全面发展的主要因素^[10]。

从人民需要的角度分析,有学者提出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中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收入、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有了极大地改善。居民收入大幅提升,2012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长期困扰人们的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有了很大改善,覆盖

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11]。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人民的需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内涵来讲,人们对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水平、精神生活等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品质的需要,期盼物质生活更丰裕,文化生活更丰富。从外延来看,人们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人们的需要层次现已超越了“物质文化”传统领域,延展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个方面^[8]。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逻辑

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准确认识和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并由此确立主要工作任务,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这是党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此,学界给予了极大地关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有学者回顾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过程,并根据党在不同时期承担历史任务的不同,将其基本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认识到,当帝国主义向我们发动侵略战争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此时,我们应团结国内各个阶级进行民族斗争去反对帝国主义。当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经济、政治、文化等温和手段对人民大众进行压迫时,我国内部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大众与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各个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党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依旧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实

践探索中,尽管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党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识,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12]。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尽管社会主要矛盾在表达上保持着延续性,但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其基本内涵都在逐步丰富和扩展。党的十九大正是在牢牢把握这一历史逻辑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问题和社会现实,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13]。历史充分表明,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前提,是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顺利展开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逐步深化了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形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正确认识提供了历史借鉴。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意义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的讨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从彰显党的先进性的角度上分析。有学者提出,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达,体现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14],集中展现了党的担当精神、为民情怀、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3]。第二,从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上分析。有学者提出,这一判断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我们深化认识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论。即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始终不忘的“初心”和“使命”^[15]。第三,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作用上分析。有学者指出,“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新时代主要矛盾的确立使“五大发展理念”具备了更加牢靠的理论依托^[16]。第四,从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作用上分析。有学者提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为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时代特征,明确中心任务,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奋力开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和实践依循^[17]。也有学者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揭示了制约我国发展的症结所在,明确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为新时代谋划发展、推动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18]。第五,从对开启世界历史新征程的角度上讨论。有学者提出,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吹响了世界历史开启新征程的时代号角,以此为依据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实践探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自身独立性、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借鉴,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9]。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

深入认识和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是研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学界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进行了解读。

第一,从宏观层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有学者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和具体表现,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在人民生活方面表现为发展的质量不高,效益不好;在公平正义方面表现为发

展的不均衡;在社会安全方面表现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在民主法治方面表现为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决策尚未到位等^[20]。也有学者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局部生产力相对落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不足和社会各领域供给不平衡等三个方面^[21]。

第二,从微观层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其一,对“美好生活需要”内涵的解读。一是从内容层面上分析。学界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看法较为一致,普遍认为“美好生活”的内涵和外延意义,都远远超出了“物质文化生活”的界定。“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涵盖了经济发展的领域,而且拓展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个领域^[22]。二是从特征层面上分析。有学者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分析了美好生活需要的特点,提出从纵向来看,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多样性、多面性、多层次和广泛性的特点。从横向来看,美好生活需要又具有发展性、反复性、主体扩展性和形态丰富性等特点^[23]。三是从结构层面上分析。提出“美好生活需要”并不是指某种单一的需要,而是一个包含了多种需要在内的层级结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需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只有各个层次上的需要整体联动、和谐一致地发展,才能称得上美好生活^[2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意味着生存需要得到较高质量的满足,还意味着社会需要、尊重的需要、求知的需要、美的需要、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较程度的满足^[25]。其二,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内涵的解读。我国社会生产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落后的社会生产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不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构成因素,目前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所谓“不平衡”,主要是指社会各部分之间发展存在差距和不协调。具体表现为各

个领域之间、城乡和区域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代际之间发展不平衡等。所谓“不充分”,是指发展质量不高、发展效益不好。具体表现为社会生产力不充分、社会创新能力不足、社会发展动力不充分、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不充分等^[26]。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也有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国家治理方面,尽管党的十八大“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正在稳步推进,但是立法科学化、执法严格化、司法公正化、普法深入化任重道远。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也存在许多繁重的任务亟待解决^[11]。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二者之间相互区别。不平衡发展侧重于发展的横向维度,如范围、领域等,而不充分发展侧重于纵向深度,着眼于质量、层级等。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是相互包含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9]。

四、纾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举措

尽管我党已充分认识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但是提出问题并不意味着解决问题。为有效地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学界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第一,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认识上分析。有学者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思想指南、基本方略、价值取向和人民情怀,我们应坚持将其转化为政治信念、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27]。也有学者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指导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践行者,是解决新矛盾、实现新目标的动力源泉和依靠力量。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由此,新目标以人的现

实生活为关照对象,以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奋斗目标^[28]。

第二,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方略上分析。有学者提出在政治准则方面,坚持把“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在国家治理方面,坚持依法治国,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在国家发展方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11]。也有学者认为,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发展要素和发展阶段的关联性,追求质量效益优先、美学意义或美化色彩等整体性发展理念^[5]。在充分发挥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还要大力激发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21]。

第三,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策略上分析。有学者认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因素,并从如何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提出了协调发展理念。协调发展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目标、手段和评价尺度。在社会建构上,它具有政策依赖性。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它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在实践要求和价值取向上,它具有人民性。基于协调发展的以上特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政策协同和优化群众参与等^[29]。有学者指出,在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30]。还有学者从矛盾主要方面的主要问题入手,提出“不平衡”是矛盾主要方面的主要问题,贫富差距是发展不平衡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因此,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就聚焦为一个重要任务,即消除贫富差距。当前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制度未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如果消除贫富差距的阶段性立足在分配领域推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但从分配入手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只有从生产领域入手,以生产力的极大丰富为前提,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

第四,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实践上分析。学界对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在制度建设层面上,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为体制不健全,机制不灵活、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有待加强。因此,我们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31]。在经济领域中,学者们提出了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具体路径:针对城乡、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策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决方案。针对创新性、改革、开放不充分的问题,提出了加快建设创新性国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策略^[32]。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提出要构筑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恢复人的本真性,激发社会活力;要批判工具理性,倡导价值理性,用“全面的人”取代“单向度的人”^[33]。并且,强调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先导”功能,推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34]。

五、辩证认识和处理与社会主要矛盾相联系的各大关系

为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国内学者还着重探讨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转化前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对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进

行了解读,但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主要有三种不同见解: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由。有学者指出,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历史方位的新判断,绝不是由逻辑推演和主观判断而产生的,而是基于客观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预示着我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些足以说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由此必然带来时代的变化^[3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量”的规定。但历史性成就仅仅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外在尺度”,社会主要矛盾才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尺度”。它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新时期向新时代“质”的转变^[36]。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表现和必然结果。有学者从对十九大报告的理解出发,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原因,而是先有我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才产生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结果^[37]。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依据。有学者指出,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据是多维的,其中生产力是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方位,即进入新时代的决定性依据,而党的十八大后我党形成的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在内的新思想也是重要判断根据^[38]。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尽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学界分别从事实 and 理论两个层面上,分析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是从现实层面上分析。有学者指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辉煌成就,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但我国仍存在一些制约着社会发展的短板,在民生、法治等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还存在差距;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教育水平“大而不强”;虽然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但大多数制造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因此,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39]。

二是从理论层面上分析。有学者从毛泽东的社会主要矛盾思想和质量互变规律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是由该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的世情和国情,其根本原因是支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发生质变,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根本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的量变过程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部分质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支配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40]。也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一个凝聚不变的“结晶体”,它在保持“质”不变的同时,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性的部分质变”阶段。因为新时代是一个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部分质变阶段”,所以该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才会发生转化^[7]。

(三)转化前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

关于对转化前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学界普遍认为转化后的社会主要矛盾与转化前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涵义是一种相互联系、一脉相承的关系,是矛盾内涵的升华与拓展。

一是从二者之间的统一性上分析。有学者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

性质与以往不同,不仅不存在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对立关系,二者还具有内在抽象的共同性:都是生产和供给难以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41]。从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达来看,二者“供给”和“需要”的主体框架是一致的,仅仅是矛盾双方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和替代旧有矛盾,而是在旧有矛盾基础上的一种渐进式提升,一种“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供需矛盾的转变^[42]。也有学者指出,基于仍然不发达的社会生产状况,新旧矛盾之间并非是断裂、替代关系,而是递进关系,其共性在于二者同为人民需要与不充分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关系范围^[43]。还有学者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只是原有主要矛盾的升级版,并没有跳出矛盾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与供给”的矛盾范畴,只是社会主要矛盾内涵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44]。

二是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上分析。有学者提出转化后的主要矛盾是对转化前主要矛盾内涵的充实与拓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人民需要的内涵、国家发展的理念、经济发展模式、分配机制的原则、社会建设的重心、人民生活的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42]。也有学者指出,转化前后矛盾对“需要”和“发展”的内容表达有差别。二者对应着“富起来”和“强起来”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需要的视角看,与“物质文化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更加丰富。从发展的视角看,“落后的社会生产”以追求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以新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45]。

六、进一步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梳理与分析,不难看出,学界主要从矛盾转化的逻辑依据、时代意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举措等方面进

行了比较集中的探讨。总体来看,阐述较为全面深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达成了共识,它们对正确理解和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思想提出的时间较短,国内学者对其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所以,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需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研究

学界已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理论、唯物史观的人本学特征和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观等多个视角阐述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合理性。研究成果丰硕,但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首先,我国一些学者对习近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逻辑的研究范式呈现出一种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关注的重点是习近平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何种观点和原理,满足于给习近平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各部分内容贴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标签,这样将妨碍发现习近平矛盾转化思想的理论创新点,进而导致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片面化和碎片化的理解。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及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时指出,我们应采取一种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即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解决具体实际问题而从马列主义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46]。由此,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阐释习近平矛盾理论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还要致力于探讨习近平是如何创新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例如,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前提是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没有发生变化。由此看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进入新时代都是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的“质”不变的阶段性部分质变。习近平的矛盾理论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和阶段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

会主要矛盾理论。其次,要进一步挖掘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渊源。尽管有很多学者已经追溯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社会矛盾思想的发展历程,整体地分析了社会矛盾的内涵、性质、作用和意义等,但是缺乏对需要和生产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分析。关于需要与生产关系的讨论,古典经济学家早就已经开始,并在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此,我们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和需要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二)需要进一步深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

首先,学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内涵进行了解读,尽管学界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看法较为一致,但研究视角相对单一,更多的是停留在简单罗列其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缺乏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内涵本质的探究。如前所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一个层级关联性结构,它强调的是人需要发展的多方面性、协调性和整体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终极的价值追求——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继承和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终极奋斗目标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其次,国内学者重点关注的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人们需要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物质资料的丰富对人民需要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消费主义社会中,人们的需要被激发、被创造,民众消费追求商品和服务的符号意义而非其使用价值等需要异化的现象。奥尔德佛的ERG理论曾提出,人的需要不仅具有激励作用,而且还有挫折退化的特性,认为如果人们高层次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会强化他们满足低层次需要的欲望。现阶段,我国人民的物质需要已基本得到满足。在人民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大量的拜

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现象,因此,为防止需要的“受挫—回归”,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货币过度依赖,引导人们派生出高层次的需要,我们必须为高级需要寻找新的满足手段。最后,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内涵的研究,更多地是停留在对文件政策的文本解读层面,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扩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统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由此,我们应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跨学科协同研究。

(三)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西方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学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我国的历史经验、基本国情为出发点,缺少对国外经验教训辩证地学习。尽管已有学者开始注重对西方的理论借鉴和经验学习,从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和罗尔斯的正义分配论等来讨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解决问题,但是相关研究数量较少,援引与学习并不深入。学习西方国家在国家现代化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等领域中的成功经验,是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如,为了有效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低碳经济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涵盖了“庇古税”“污染者付费”、平整竞技场理论等。他们主张通过将市场价格机制引入到环境治理领域、加大排污者的生产成本、追加征收边界调节税等手段,以促进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这些国家低碳经济的实践经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四)加强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路径和对策等实践性研究

学界已从思想认识、基本方略和实践举措

等层面来思考如何满足人民的新需要和打破发展失衡格局,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很多学者注重从宏观维度和理论层面上讨论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问题,提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基本明确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遵循和总体布局。对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而言,理论的指导固然重要,但是不关照社会主要矛盾在各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矛盾是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因此,学界尝试从经济制度、国家治理、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探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案。但是涉及到具体领域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提出的实践对策空泛而不具体。例如,有些学者在谈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如何体现这些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却没有具体的实施路径和方法。同时,学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及其应对策略的主题还鲜少有人涉及。民族文化作为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提高文化软实力,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随着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开始走向普罗大众,文化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部分大众媒介为尽可能获得商业利润,开始出现低俗化、泛娱乐化的倾向,这些都是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为促使我国文化全面健康发展,我们应加强主流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由此,加强对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现的纵深研究,探索我国文化建设具体措施,这些都将是我国学界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 周海荣,何丽华.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视域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J].社会科学,2018(4):27-28.

[3] 王永贵,徐俊.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战略判断的深刻意涵——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之一[J].苏州大学学报,2017(6):8-13.

[4] 罗永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6-9.

[5] 王丹,邱耕田.科学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3):13-16.

[6] 高文兵,吴争春.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论的三重逻辑[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34-139.

[7] 刘同舫.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7):47-52,189-190.

[8] 艾四林,康沛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1):13-18.

[9] 袁银传,吴桂鸿.全面深入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J].思想理论教育,2018(6):4-10.

[10] 翁良殊,路日亮.人的需要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45-153.

[11] 杨德山,康旭忻.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解读[J].理论探讨,2018(1):11-15.

[12] 黄一兵.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和启示[J].中共党史研究,2018(1):11-20.

[13] 王向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依据[J].人民论坛,2018(4):56-57.

[14] 李燕.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解和认识[J].学习与实践,2017(12):19-23.

[15] 郝立新.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中国高等教育,2017(22):14-16.

[16] 冯立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意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1-07.

[17] 张兴茂.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3-19.

[18] 秋原.深刻领会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EB/OL].求是网.
http://www. qstheory. cn/dukan/qs/2017-12/15/c _ 1122089498.htm.

[19] 林密.马克思“世界历史”视域中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其意义初探[J].天津社会科学,2018(2):4-

- 11,69.
- [20] 李景治.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正确认识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1):4-12.
- [21] 侯衍社,侯耀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1):36-41.
- [22] 韩庆祥,陈曙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2018(1):5-16.
- [23] 邱柏生.试解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内涵和特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2):4-9.
- [24] 马拥军,陈瑞丰.如何看待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2):5-10.
- [25] 杨小勇,王文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及化解路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1):14-28.
- [26] 陈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J].重庆社会科学,2017(12):26-32.
- [27] 田鹏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要求[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3):14-19.
- [28] 张三元.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J].思想理论教育,2017(12):14-20.
- [29] 任鹏.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与协调发展的新要求[J].山东社会科学,2017(12):26-31.
- [30] 颜晓峰.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2):5-13.
- [31] 王中汝.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提出的新要求[J].理论前沿,2018(3):26-29.
- [32] 蒋永穆,周宇晗.着力破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20-28.
- [33] 种海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政治美学与美好生活的人学逻辑[J].江苏社会科学,2020(5):11-19, 237.
- [34] 吴宏政.“价值观先导”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基本功能[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双月刊),2019(3):113-120.
- [35] 虞崇胜.精准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J].江汉论坛,2018(1):24-28.
- [36] 吴宏政.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跃迁理解“新时代”[J].湖湘论坛,2018(2):38-44.
- [37] 卫兴华.辨析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解读的理论是非[J].人文杂志,2018(4):1-5.
- [38] 王继承,王永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误读样态、匡正及其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9(6):17-25.
- [39] 汪亭友.如何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J].人民论坛,2018(4):58-59.
- [40] 吴家华.正确认识和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J].红旗文稿,2017(24):7-9.
- [41] 卫兴华,赵海虹.怎样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经济纵横,2018(1):1-8.
- [42] 赵书昭,杜杨,宋新宇.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诸多“变化”的分析与思考[J].新视野,2018(2):24-29.
- [43] 董玥,陈锡喜.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论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0-17.
- [44] 谢海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与所处历史阶段“不变”的辩证逻辑分析[J].东南学术,2020(2):54-60.
- [45] 陈锡喜.主要矛盾的“变”与初级阶段“不变”相统一的理论辨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1):11-16.
- [4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